

贫穷的国家和地区

1 穷国的经济

世界上的人大多数非常贫穷，倘若我们懂得穷国的经济学，就会理解经济学中许多真正重要的问题。世界上的穷人大部分靠农业谋生，倘若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就会理解穷国的经济学的大部分主要内容。

经济学家发现，要想理解迫使穷人做出自己选择的有关偏好和稀缺方面的各种因素十分困难。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人大部分很穷，他们凭着自己的劳动挣得微薄的收入，这微薄的收入要有一半以上用于购买食物。这些穷人基本上都住在低收入国家，其中大多数人靠农业谋生。有许多经济学家都没能看懂的是，穷人和富人同样地关心如何改善自己及其子女的生活状况。

近几十年来，我们所了解的农业经济学在大多数富于理智和见多识广的人们看来，显得十分地不可思议。许多低收入国

* 这一章是以我于 1979 年 12 月 8 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稿为基础写成的，该演讲稿的版权为 1979 年诺贝尔基金会所有。仅在此感谢加里·贝克尔 (Cary S. Becker)、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哈伯格 (A. C. Harberger)、盖尔·约翰逊 (D. Gale Johnson) 以及保罗·舒尔茨 (T. Paul Schultz) 等为我写作此文所提出的宝贵建议。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伊萨·舒尔茨 (Esther Schultz)，是她的支持使我能够清晰地表述自己的思想。

家的农业生产都具备着潜在的经济能力来生产足够的食物，以满足仍然在不断增长的人口之需要，并且可以提高穷人的收入，大大地改进其福利状况。改进穷人的福利的关键性生产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 而是提高人口质量 提高知识水平。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工作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人力资本经济学的理解，尤其是对于科学研究的经济意义、农民对可带来收益的新技术的反应、生产与福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家庭经济学的更进一步了解。然而，他们的这种发展经济学却犯了几个智识上的错误。其中一个主要的错误是，他们假设标准的经济理论不适用于理解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情况，而需要建立一门独特的经济理论，才能解释这类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直到事实证明了为此目的而逐步研究出来的各种模式至多也不过是经济学家头脑中的好奇心的产物，人们才不再那么普遍地赞赏这些模式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文化和行为学者们对其研究成果的此种用法令人同情地感到忧虑，一些经济学家还是转向用文化和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他们所认定的所谓低收入国家穷人的经济行为。但是，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与适用于解决高收入国家的相应问题一样，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也适用于解决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匮乏问题。

发展经济学的第二个错误是忽略了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当古典经济学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西欧大多数人民正在勉强从其耕种的土地上“挖”出自己的生存必需品，那时他们也注定只能享有很短的寿命。这就是说，早期的西方经济学家所要研究和论述的经济环境与当今这些低收入国家普遍具有的经济环境十分相似。在李嘉图的时代，英国劳动者家庭收入的一半必须用于购买食物，这种情况与今天的许多低收入国家一样。马歇尔指出，在李嘉图发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税收》(*Princi-*

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1817 的那个时代“;英国劳动者每星期的工资常常要比半蒲式耳优质小麦的价格还低”^①。现在一个印度农民的周工资也略低于两蒲式耳小麦的价格^②。人们长期所积累的经验以及穷人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可能会大大地有助于理解今天的低收入国家所存在的问题及其获得解决的可能性。这种理解远比那些有关土地、生态,以及未来技术的最详尽和最准确的知识更为重要。

发展经济学的不足之处,还在于缺乏对人口问题的历史性认识。根据现在的世界统计资料进行的推断和阐释,我们所得出的骇人结论是:穷人们像旅鼠一样地大量繁殖造成了他们自己的灾难。然而,在我们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历史上,当人们很穷的时候,并没有发生这种人口大量增殖的现象。因此,有关当前穷国的毁灭性人口增长的预言同样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1.1 对土地的估计过高

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即“自然的土地观”认为“适宜于生产食物的土地实际上固定不变,而耕种这些土地所能提供的能量正在逐渐被耗尽。根据这种观点,现有的耕地不可能继续

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第 8 版 纽约 麦克米兰公司,1920 年 第 XV 页。

② 西奥多·舒尔茨:“人类时间价值不断增长的经济学”(On the Economics of the Increases in the Value of Human Time Over Time) 原载马修斯主编的《经济增长和资源(第 2 卷)趋势和要素》(*Economics Growth and Resources, vol. 2: Trends and Factors*) 伦敦 麦克米兰公司,1980 年 以及“国际经济学会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东京。

为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另外一种观点，即“社会经济观”认为，人类的能力和智识能够使其减轻对耕地、传统的农业，以及正在被消耗掉的能量资源的依赖，而且能够降低为日益增长的世界人口提供食物的物质生产的成本。通过研究，我们找到了耕地的替代物，这是李嘉图未能预见到的。而且，当家庭收入增加时，父母会选择少要一些孩子，用孩子的质量代替数量，这一点，是马尔萨斯未能预见到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长期以来被贴着沉闷的科学之标签的经济学现在表明，苍白无力的自然土地观在有关食物的看法方面并不符合历史。历史已经证明，我们能够通过知识的进步来增加资源。我很赞同玛格丽特·米德 (Margaret Mead) 的说法：“人类的未来是没有尽头的。”人类的未来并不是预先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而是要由人类的智识发展来决定。

土地生产率的差异无法解释为什么世界上一些长期以来即有人类定居的地方的人民会非常贫穷。多少年来，居住在降雨稀少、土地生产率不高的德干高原和居住在土地生产率很高的印度南方的印度农民，同样一直都很贫穷。在非洲，无论是生活在撒哈拉大沙漠南部周边不毛之地的人们，还是住在大峡谷那陡峭山坡上稍稍肥沃一些的土地上的人们，或者是生长在尼罗河口及其冲积平原这类大粮仓上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全都十分贫穷。同样，被很多人大力宣扬的在低收入国家广泛存在的人均土地之差异，也不是造成明显贫富差距的原因。对耕地来说，最要紧的是各种刺激因素和与农民必须通过投资来提高土地的有效供给相关联的程度，这些投资包括农业科学研究和提高人的技能。构成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共同内容是，耕地的经济重要性在下降，而人力资本，即知识和技能的經濟重要性在上升。

一般来说，经济学家们通常不顾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在对土地的看法方面仍然遵循着李嘉图的思想。但是，李嘉图的那种所谓“原始的和不可破坏的土壤能力”的观念，即便过去曾经适用，现在也已经不再适用了。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收入国家中地租占国民收入增长的份额，以及与之相关的地主的社会政治地位，已经明显地有所下降；在低收入国家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为什么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该理论认为地租是由价格所造成的，而不是形成价格的原因）逐渐失去了其经济刺激的意义呢？其主要原因有二：首先，长期以来的农业现代化已经把原始的土地改造成了比在其自然状态下具有更高生产率的资源；第二，农业科学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以替代耕地的东西。除了某些地区以外，欧洲的原始土壤的质量大都十分低劣，但是现在它们却具有了较高的生产效率。芬兰的土质原本比邻近的苏联西部地区土地的生产效率要低，然而目前芬兰耕地的质量却大大超过了苏联。日本耕地的生产率最初远远低于印度北部的耕地生产率，而如今却比后者要高得多。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农业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其中包括具体体现在购买化肥、杀虫剂、农药、生产设备，以及其他生产投入方面的研究工作。农业科学研究的发展，使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可以替代土地的新资源，或者说是扩大了土地的面积和生产能力。这种替代的过程可以通过玉米这种作物得到很好的证明 美国 1979 年玉米的种植面积，比其 1932 年的玉米种植面积少了 1 336.5 万公顷 但是其产量却高达 77.6 亿蒲式耳 是 1932 年玉米总产量的 3 倍。

1.2 对人口质量的因素估计过低

土地本身并不是使人贫穷的主要因素，人的能力和素质则是决定贫富的关键。也就是说，旨在提高人口质量的投资能够极大地有助于经济繁荣和增加穷人的福利。对儿童的关怀照顾；在家务及职业工作方面的经验；通过学校教育获得知识和技能；以及其他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投资，都可以提高人口质量。只要没有不稳定的政治因素的干扰，低收入国家的这类投资都能成功地促进经济繁荣。这些国家的穷人并不是那种经济学上打不破的贫穷均衡状态的永久囚犯，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够绝对地消除一切经济改革的作用，并使穷人放弃改善经济地位的奋斗。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农业生产中，穷人确实已经对能够改善生活的较好机会作出反应了。

这些既从事生产劳动又参与分配资源的农业劳动者和农业企业家们通过对新的机会和刺激因素做出反应，构成了农业生产中人力资源占主导地位的远大前景。然而，在许多低收入国家，这些直接表现在农民们所接受的农产品价格和他們所支付的生产及消费品价格当中的刺激因素，却遭到了严重的扭曲。这种由政府造成的扭曲使得农业本来能够对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大减少了。

尽管低收入国家的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要多，但是由于其国内的政策一般总要有利于城市，而不惜牺牲农村人民的利益，从而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倾向于推行歧视农业的扭曲政策。城市消费者和工业的政治影响使其能够以损害大量农村穷人的利益为代价，迫使食物的价格低廉化。在农业生产固有的落后状态和虽然经过“绿色革命”其经济重要性仍然较小的社会环境中，这种对农业的歧视已被合理化了。人们主观地认为，这些社会地位低下的庄稼汉对经济刺激不会有什么反应，而且会极其顽固地坚持使用传统的耕作方式不肯改变。在这些国家，迅速的工业化被看成是经济进步的关键，因此要在政策上给予工业极大的优先权，并保持食品的低廉价格。目前有些国际经援组织仍然支持这种观点，并且一些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学家们还在理论上将其合理化了。这种现象，虽然令人遗憾，然而却是事实。

全世界的农民都在与成本、利润和风险打交道，从这一角度讲，他们都是时刻在算计个人收益的经济人。在自己那小小的、个人的和进行资源配置的领域里，这些农民都是企业家。他们总是能够十分精妙地、敏锐地与经济形势相适应，以致使得许多经济学专家都无法认识到这些人的效率有多么高^②。尽管由于

① 有关此问题的比较全面的讨论，可参见我的“论农业的经济与政治学”(O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Agriculture)一文 原载西奥多·舒尔茨主编的《农业刺激的扭曲》(*Distortions of Agricultural Incentives*)(印第安那州·布卢明顿 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3~23页。

指发展中国家为解决粮食问题而推广的大规模改良农业的活动。——译者注

② 参见西奥多·舒尔茨:《传统农业的变革》(*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纽黑文 耶鲁大学出版社,1964年 纽约 阿尔诺出版社,1976年再版)

教育、健康，以及个人经历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在对新知识和新信息的感知、理解和采取适当行动的能力方面存在着差距，但是他们却为企业家素质提供了最基本的人力资源^①。在大多数农民家庭中，妇女在家务生产活动中对其时间的分配，以及在使用农产品和购买商品方面，也都是企业家^②。由于农业一般地说是一个高度分散的经济生产部门，因此，在一个个小规模的生产单位中，成千上万的男女劳动者都表现出了配置资源的能力。然而，在由政府接管了这种企业家职能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却没能成功地提供一种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配置方法，来替代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能力。这些农民和农妇们配置资源的能力和作用十分重要，他们的经济机会也事关重大。

在科学研究中也必须具备企业家的能力。这种工作需要稀缺资源进行组织和分配，总会有些风险。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对完全未知或部分未知的问题进行探索的动态风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金、组织和有能力的科学家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仅有这些还不够，还需要具备科研工作的企业家能力。这一职能由科学家或者在经济研究部门工作的其他人员来履行。在现有的知识水平状态下，必须有人来确定如何分配可得到的有

① 菲尼斯·韦尔奇 (Finis Welch), “生产过程中的教育”(Education in Production), 原载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Economy* 第 78 卷 (1970 年 1~2 月) 第 35~39 页以及《农业刺激的扭曲》(*Distortions of Agricultural Incentives*) 第 259~281 页, 韦尔奇的“人力资本投资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The Role of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 in Agriculture), 《农业刺激的扭曲》第 223~245 页; 罗伯特·埃文森 (Robert E. Evenson) 的“低收入国家中改进农作物和牲畜品种的科研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Research to Improve Crops and Animals in Low-Income Countries)。

② 西奥多·舒尔茨主编的《家庭经济 婚姻、子女和人力资本》(*Economics of the Family: Marriage, Children, and Human Capital*)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4 年。

限资源。

1.3 不平衡的必然性

人们通常认为，一国的农业生产量向日益增长的状态转化的过程就是农业的现代化。在此过程中，由于可能得到更好的机会，所以必须调整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在一个动态的经济过程中，应付不均衡的能力具有很重要的价值^①。这种不均衡是必然的，无论是法律还是公共政策都无法将其消除，花言巧语也肯定不能改变经济的不均衡状态。各国政府都不可能有效地发挥农民企业家的作用。

将来的历史学家毫无疑问地会对近几十年间经济刺激不断遭到损害的现象和程度感到困惑不解。近几十年来，权威的知识界人士对有关农业刺激的观点持敌对态度，流行的经济政策也蔑视对生产者进行经济刺激的作用。盖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指出，很多低收入国家在农业方面的巨大经济潜力还尚未发挥出来^②。人们越来越欣赏的，是在技术上进行变革的可能性，而对必须给予这些国家的农民一些经济刺激，以使这种

① 参见西奥多·舒尔茨：“应付不平衡能力的价值”(The Value of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Disequilibria) 原载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第 13 卷 1975 年 9 月)：第 827~846 页。

② 盖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潜力：它们是否会得以发挥？”(Food Production Potential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ill They Be Realized?)，原载经济研究局非定期出版论文集第 1 号(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麦卡莱斯特学院，1977 年)以及同上著者：“减少经济刺激之扭曲的国际价格与贸易”(International Prices and Trade in Reducing the Distortions of Incentives)原载《农业刺激的扭曲》(*Distortions of Agricultural Incentives*) 第 195~215 页。

潜力得以发挥的认识，却十分混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缺乏相关的信息，或是由于农民所面对的成本和价格都被扭曲了。尽管农民需要能够带来利润的刺激，他们却仍然没有进行必要的投资，其中包括购买较为优良的机器设备和其他生产性投入。政府的干预是目前缺乏最适度的经济刺激的主要原因。

1.4 在人口质量方面取得的成就

现在让我们看看在农业和非农业这两种经济部门的人口质量方面所获得的明显收益。这里所说的人口质量包括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本。我已经表明的论点是，当我们能够在某种情况下给人力资本的概念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时，就会令人感到模棱两可；同样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通常意义上的资本理论，尤其是各种经济增长模式中的资本概念^①。资本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概念，并且当我们用这两重性来解释作为一种动态过程的经济增长问题时，一般来说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用资本的两重意义来解释经济增长时之所以必定会产生矛盾，是因为对成本的阐述会涉及到投资受损的问题。例如，一旦某个农民投资于马拉的机械，那么这种机械对于使用拖拉机来说就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了。另一个原因与这种资本所提供的服务趋势的价值的贬损有关，这种价值的贬损会随着增长周期的不断变动而发生变

^① 西奥多·舒尔茨：“人力资本 政策问题与研究机会”（Human Capital: Policy Issues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原载 *Human Resources*（纽约 全国经济研究所，1972 年）。

化。但是，更糟糕的仍是那种在涉及基本的资本理论和各种增长模式的资本聚集问题时所做出的假设，即认为资本是同质的。事实上，不仅在农业生产中，而且在所有其他生产活动中，每一种资本形式都具有其特定的性能，它可能表现为一座建筑物、一台拖拉机、一种特殊类型的化学肥料、一眼水井，以及许多其他的各种形式。正如希克斯 Hicks 告诫我们的 这种资本同质性的假定是资本理论的灾难^①。无论是从要素成本的角度，还是从其许多部分的整个服务期间的价值贬损的角度来解释资本聚集，我们都可以通过分析随着由于收益率的不同而造成的资本不均等变动的经济增长动态，来证明这种假定很不恰当。现存的所有增长模式也都无法证明，这些不均等的东西能够相等。

但是，人们为什么还要试图去做这种办不到的事呢？要真是看不到这些不均等，我们还必须设法自己造出来，因为它们是企业增长的主要动因，其之所以成为主要动因，是由于这些不均等是令人不得不关注的增长的经济信号。于是，经济增长的最本质部分之一，就被这样的资本聚集给掩藏起来了。

人力资本价值的增长要根据人类由其所获得的附加福利来确定。人力资本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助于提高人们的企业家才能，这种才能在农业和非农业生产中，在家庭生产中，在学生们分配自己受教育的时间和其他资源时，以及在向较好的职业机遇和生活地点迁移的过程中，都具有很高的价值。这种企业家式的能力对于满足作为一个整体的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也会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研究人口质量的方法是把这种质量当做一种稀缺资源，

^① 约翰·希克斯 John Hicks):《资本与增长》(*Capital and Growth*)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3章第35页。

这意味着它具有经济价值，还意味着获得它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在分析可决定在一段时间内所获得的人口质量的类型和数量的人类行为时，关键是了解人们从所增加的人口质量中可获得的收益与为得到这一质量所需付出的成本之间的关系。当其收益超过成本时，人口质量就会提高。这意味着任何一种质量因素的供给的增加都是对其需求的反应。在这种按照供求关系探讨人口质量投资的方法中，所有的质量因素都被看做是在一段时间内有用的、耐久的和稀缺性的资源。

我的假设是，许多低收入国家这些年来从各种人口质量因素中所获得的收益一直在增长；企业家从其配置资源的能力中所获得的收益在增长；这些国家从其在抚养照料儿童、发展教育和改善人民健康状况等方面的投资中所获得的收益也在增长。而且，他们还通过降低获得大部分这类质量因素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进一步提高了其收益率。在此期间，这些低收入国家对于儿童质量和成年人本身质量的需求的不断增长，有利于使他们只想养育较少数量的子女^①因而提高人口质量的运动有助于解决这些国家的人口问题。

① 加里·贝克尔 (Gary S. Becker) 和奈杰尔·托姆斯 (Nigel Toms): “孩子的天赋才能及其数量和质量” (Child Endowments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原载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 84 卷第 2 部分 (1976 年 8 月) 第 143~162 页; 马克·罗森兹威格 (Mark R. Rosenzweig) 和肯尼思·沃尔平 (Kenneth I. Wolpin): “人口出生率数量-质量检验模型: 利用双胞胎所进行的自然实验” (Testing the Quantity - Quality Fertility Model: The Use of Twins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油印版 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 1978 年 10 月)。

1.5 健康投资

人力资本理论把每个人的健康状况都当做是一种资本的储备，即健康资本，并认为其作用是提供健康服务^①。人们所具有的最初的健康资本存储的质量，一部分是先天即有的，一部分是后天获得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健康资本储备会逐渐贬值，而且越到人的生命后期这种贬值的速度就越快。人力资本的总投资涉及获得和保持这些资本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其中包括抚养照料年幼的孩子、营养、衣着、住房、医疗保健以及自我照管所需付出的成本。健康资本所提供的服务由“健康时间”，或者说是可以用来进行工作、消费以及各种闲暇活动的“无病时间”所组成^②。

毫无疑问，许多低收入国家通过人口寿命的延长所展示出的健康状况的改善，是人口质量提高的最重要表现。大约从1950年以来，在很多这类低收入国家，人口从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已增加了40%以上。婴幼儿死亡率的下降仅仅是这一成就的一个组成部分。儿童、青年，以及成年人口的死亡率也在下降。

在本书的第2章和第3章，对健康和教育这两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探讨。

^② 艾伦·威廉斯(Alan Williams)“健康服务计划”(Health Service Planning)原载阿提斯(M. J. Artis)和诺贝(A. R. Nobay)主编的《现代经济分析论文集》(*Studies in Modern Economic Analysis*) 爱丁堡：布萊克韦尔出版公司，1977年，第301～335页 格罗斯曼(M. Grossman)：《健康需求》(*The Demand for Health*) 全国经济研究所不定期出版文集第119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2年)

拉姆(Ram)和舒尔茨研究了印度近些年来的人口发展经济学^①,得出的结论与其他低收入国家的情况相一致。从1951年到1971年的20年间,印度男性从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增加了43%;女性从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增加了41%。在1971年按年龄分组统计的印度男女人口的预期寿命,从10岁以上、20岁以上,直到60岁年龄组也都比1951年要长得多。

这种人口寿命的延长在这些国家普遍产生了有利的经济意义。虽然我们很难具体地衡量出人们从较长的寿命中究竟能获得多少报偿,但是厄舍(Usher)还是为我们设计出一种富于独创性的经济理论,以用来确定人们从预期寿命的增加中所获得的效用。他所进行的实证性分析表明,预期寿命的延长所附加的效用大大提高了个人收入的价值^②。

较长的人口寿命提供了额外的刺激,促使人们去接受更多的教育,因为教育是对未来收益的投资。父母们增加了对其子女的投资;进一步的在职培训变得很有价值;更多的健康资本和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寿命的延长使人们作为劳动大军的一员从事生产劳动的时间更长,还使“生病时间”减少。较好的健康状况又转而导致了生产劳动中每个人时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① 拉蒂·拉姆(Rati Ram)和西奥多·舒尔茨:“寿命、健康、储蓄和劳动生产率”(Life Span, Health, Savings, and Productivity) 原载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第27卷(1979年4月)第399~421页。

② 丹·厄舍(Dan Usher):“由预期寿命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衡量方法所存在的问题”(An Imputation to the Measure of Economic Growth for Changes in Life Expectancy) 原载米尔顿·莫斯(Milton Moss)主编的《经济和社会成绩的衡量方法》(*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纽约:国家经济研究所,1978年)第193~226页。

拉姆—舒尔茨 (Ram - Schultz) 的研究证明了印度由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增加的收益是改善劳动力健康状况的结果。一个最生动的例证是, 实施根治“周期性”发作的疟疾的计划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产生的作用。

1.6 教育投资

人口质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受了更多的教育。但是计算上学期间所需花费的成本时, 必须将儿童为其父母所做工作的价值包括在内。因为即使是非常年幼的孩子, 在其上学的最初几年, 大多数父母也都要牺牲掉这些孩子通常所做的工作为自己带来的价值^①。教育的另一个独特性质就是可被称为年代效用的作用, 当每个孩子都能接受更多的教育时, 就会产生这种效用。较为年长的人们大多数都从小就是文盲, 在其长大之后还要继续过着很少或根本不可能有机会上学读书的生活; 而这些受过较多教育的孩子们在进入成年时期以后, 却会获得教育所带来的收益。

^① 英迪拉·玛希加 (Indra Makhija) “印度农村孩子的经济作用及其对出生率和学校教育的影响”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Children and its Effects on Fertility and Schooling: Rural India), 选自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集, 1977 年 罗伯特·小肖特利奇 (Robert L. Shortlidge, Jr.) : 印度农村学校入学人数的社会经济模式 (A Social-Economic Model of School Attendance in Rural India), 原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系不定期出版论文集第 86 号 (纽约州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 1976 年 1 月); 马克·罗森兹威格和罗伯特·埃文森 (Robert E. Evenson): “印度农村家庭孩子的出生率、学校教育和经济作用: 计量经济学的分析” (Fertility, Schooling and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Children in Rural India: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原载 *Econometrica* 第 45 卷 (1977 年 7 月) 第 1065~1079 页。